

「巨人」甦醒， 台港付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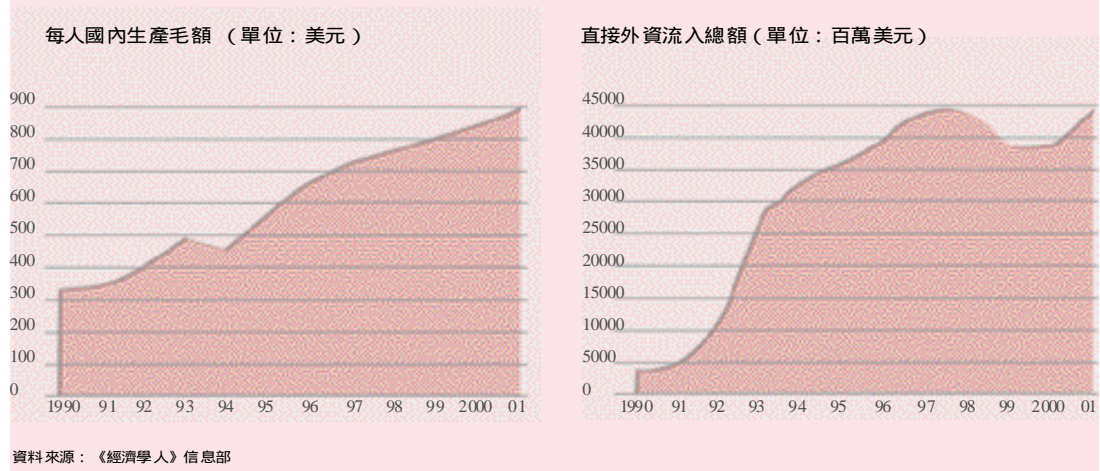
對許多台港人士而言，就在兩地經濟與日益強大的中國大陸更加糾結在一起之際，最近浮現的經濟問題，絕對不是偶發事件而已。有關「中國大陸的利益是以台港經濟損失為代價」的疑慮，也一直存在著。其實，他們的疑慮是有待商榷的。

拿破崙曾經將中國稱之為「沈睡中的巨人」，一旦醒來，將會撼動全世界。只不過，對拿破崙來說，他比較關切的是中國潛在的軍事能力；而目前，全世界密切注視的，則是中國大陸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近幾年來，就在大部分地區努力從不景氣中重新站立起來之際，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卻格外地耀眼。相較大陸境內不斷攀升的外國投資，部分鄰國的外人直接投資（FDI）卻只能維持持平水準，甚至下滑。尤其大陸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事實，似乎也成為各國戒慎恐懼的因素之一。某些評論家把大陸的入世預示為一個嶄新時代的來臨；在這個新時代中，大陸產業也將被迫與外國競爭者正面交鋒。

有許多著作討論過有關中國大陸的經濟覺醒會如何影響東南亞經濟的議題，至於對東北亞較為富裕的經濟體的影響，則較少有著作提及。在此同時，也有外國企業獲利即將枯竭的疑慮。此外，還有一項令人憂心的後果，即大陸的誘惑力，將導致其國內投資者忽視本地經濟。就在國內外投資者均在尋找大陸商機之際，當地的經濟會開始萎縮嗎？

表一：巨人的甦醒

1990年至2001年中國大陸國內生產毛額（GDP）與外國投資總額



尤其是對台灣與香港來說，挑戰並不是就此結束了。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台灣與香港不只是兩個普通的鄰居而已；地理位置的相鄰，以及彼此在歷史與種族上的關聯，台港兩地正位於中國向外發展的樞紐邊緣上。而這些鄰近關係，又讓台港兩地處於緊隨大陸向上提升的經濟浪潮的最佳位置上。然而，悲觀主義者卻認為，上述的種種關聯，將使台灣與香港的經濟更加受制於大陸經濟而產生日漸削弱的傷害。中國大陸的利益會以台港經濟損失為代價嗎？

台港經濟朝高附加價值發展

自從1949年以來，台灣即以個別實體的地位，自行行使統治權。接下來的四十年中，除偶爾發生的相互言辭辱罵與戰火交鋒外，海峽兩岸的政府實際上沒有任何的接觸。至於香港與中國的分離狀態，則更早在1841年英國接手管理這塊被割讓的土地開始。在接下來的一百五十年中，英國政府以百分之百明確而個別的方式，監管香港的經濟與政治

發展，完全沒有給中國政府涉足的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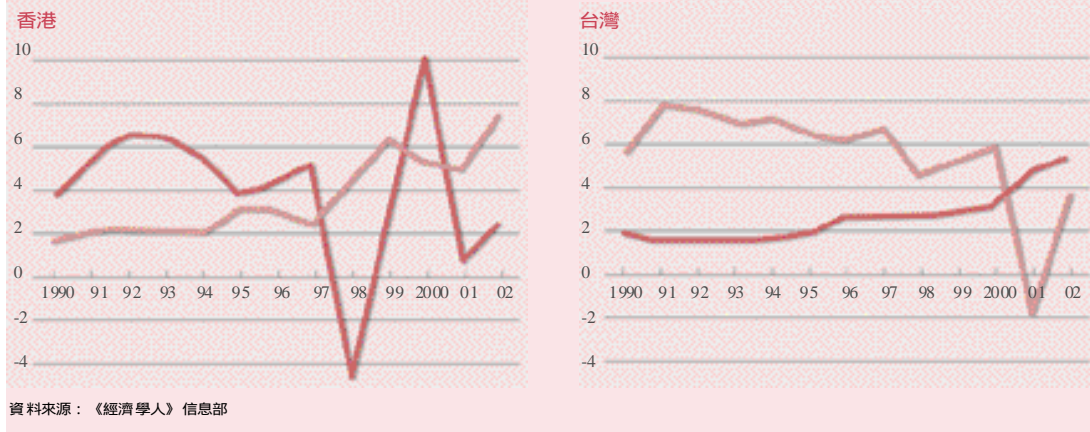
對於東亞這兩個最初如虎般強勁的經濟體來說，早期與中國大陸的分離狀態，對兩地經濟發展其實是利多於弊。1950年到1970年代後期，大陸本身「與世隔絕」的這段期間，台灣與香港的經濟，在勞力密集的製造業帶動下蓬勃地發展。即使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初期，當大陸經濟開始與全球經濟重新整合之際，這兩地的生活水準仍然持續快速的成長。這全是拜其經濟朝向高附加價值活動發展之賜，其中包括台灣資訊科技產業的硬體生產，以及香港服務提供部門的產出，特別是對新興的大陸經濟所提供之服務。

最近數年，台港兩地的政經環境再度發生變化。就在一方面朝向推廣台灣是獨立於中國大陸以外的政治實體之際；另一方面，1990年代初期，台灣政府也同時放寬了它與大陸幾乎是全面性的接觸禁令，允許兩岸人民、資金，以及商品有限度的流通。這兩種趨勢一直持續到2000年，由贊成台灣獨立的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導論

表二：從精力充沛到不過爾爾

台港主要經濟指標比較（單位：%）



民主進步黨黨員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不但終結國民黨對台灣超過五十年的統治，同時也觸發了島內史無前例的政治不穩定時期。

在此之前，儘管維持過去生活方式的安排——特別行政區（SAR）——被認為獲得了五十年保證不變的保障，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大陸主權的懷抱。但是自從權力移交之後開始，雖然香港獨特的經濟與立法系統，一直維持著既有的運作模式；然而，獲北京支持而當選的特區首長董建華所領導的政府，似乎不斷受創於各式危機，讓香港人民對於政府官員的信任感幾近崩潰。

台港同時經歷經濟最衰弱的階段

而讓這種抑鬱情況更惡化的是，台港兩地經濟同時經歷史上最衰弱的階段。2001年，台灣遭逢劇烈的經濟蕭條；即使到了今天，年失業率也維持在5%以上的水準，這是1990年代後期以前，未曾出現過的現象。至於香港，則是被1997年到1998年間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所觸動，因而導致股票與房地產市場大崩盤。之後香港又經歷兩次技術性經

濟衰退，其一，失業率從2.2%爬升到7%以上；其二，連續四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滑落，以及更進一步打擊信心的事件，即全香港正陷入對抗SARS病毒大流行的防疫作戰中。

對許多台港人士而言，在兩地經濟與日益強大的中國大陸更加糾結在一起之際，最近浮現的經濟問題，絕不是偶發事件而已。對於這種現象，可知的普遍憂慮是，現階段的衰退並非具有循環性或暫時性的性質，反而是屬於結構性的，直接由台港兩地與愈來愈具競爭性的大陸的變動關係所引起。

我們很容易就察覺其憂慮所在。台灣的報紙每天充斥資金與人才轉進中國大陸的報導。根據估計，在過去十年間，流入大陸的台商資金超過1兆美元；同一期間內，單單上海一地，可能就有四十萬台灣人民（幾乎為總人口之2%）居住在該地。在此同時，深圳口岸日益增加產量的數據，則被炒作為香港逐漸不適合擔任大陸貿易轉口港的證據，任何外國銀行在上海設分支機構的決定，往往被看做是建構香港金融中心靈樞上的另一根釘子。

在此同時，對台灣的製造業，以及香港的服務部門而言，整體局面比較像是在發展分工，也就是說，某些低階的製程向外移動，而高階的活動則繼續存在，並且多半確實在逐漸擴張。與某些人擔憂的情況正相反的是，台灣與香港都擁有複雜的產業族群，一方面是資訊科技硬體的生產，另一方面則是服務業的產能，而這兩大族群所提供的產出，均不容易在大陸被複製。

以台灣而言，台灣擁有資訊科技硬體生產與發展為主要中心的優越地位。然而，如果沒有對中國大陸更開放的人才、資源與資訊的流通，台灣將很難維持這個優勢，理由在於大陸不僅在資訊科技產品上可以大量生產，更是日益重要的銷售市場。可以斷言的是，限制與大陸的經濟聯繫，最後將自負製造業出走的後果，而非提供根留台灣的美意。去除禁令的結果，還會讓另一個被兩岸經濟聯繫限制搞得不良於行的服務部門，搖身變成經濟成長的另一個原動力。

相對於台灣，香港顯然並沒有被那些禁令搞得綁手綁腳。事實上，香港之所以能從低階的世界製造中心，逐漸轉型成高階服務的全球提供者，主要是拜對中國大陸的開放之賜（這部分經驗值得台灣借鏡並提供一個可行的發展模式）。然而儘管香港對資本流動採取開放政策，但對人員與貨品的交流，就不是那麼地自由。當香港還是大陸境內唯一提供國際化之海空交通與生活品質的城市的時候，前述情況也許不成問題。只不過，隨著大陸的政策與實體基礎建設的迅速改善，整體情勢開始有了變化。很幸運地，港府充分瞭解到這一點，一方面已經朝改善與大陸

的運輸聯繫前進，另一方面則開始放寬大陸人民進入香港的限制。

雙叉政策處方

台灣一方面需要鼓勵更重大的研發活動，另一方面也必須執行必要的基本實體與限制結構的改善。至於香港，一方面須對外界普遍疑慮會阻止自由競爭的既得利益團體開刀，另一方面則需加強經濟的技能基礎。

此一雙叉政策處方，會造成台港兩地官員的困難。長久以來台灣對未來政治槓桿平衡點的拿捏一直有爭論，尤其北京已因台商大量投資而獲利之際。無可否認地，沒有政府有讓對其長期維持侵略威脅的伙伴過好日子的想法。然而，上述處方至少是讓台灣經濟受惠發展的思考途徑。至於採取相應不理的做法，在中國大陸的經濟變得愈來愈強健之際，也絕不是明智的選擇。

對於香港來說，更進一步的整合的確會讓很多人害怕。理由在於不動產所有人（或房地產商）擔心更緊密的跨邊境聯繫，將有利於在深圳尋找較便宜的投資機會，這將會導致香港未來的自有住宅所有人離開香港。然而，如果更緊密的整合與當地改革結合後，即使必須付出更高的價格，香港房地產仍將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對香港來說，政府已逐漸接受雙叉政策處方的第一部分之際，既得利益集團是否會阻礙香港政府實施雙叉政策處方的第二部分，才是其風險之所在。

台灣總統陳水扁業已表示，與中國大陸進行「三通」（通商、通郵、通航），並非解決台灣經濟問題的萬靈丹。這句話是正確的；而且對於香港而言，也同樣地十分中肯。